

中國現代史

• 資料選輯 •

1949

◆ 中原大學政治研究室編 ◆

第一輯 參考史述

一 掀起中國大革命高潮的五卅運動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初，上海小沙渡日本紗廠二萬多工人，首先揭起反帝罷工的義旗。接着青島一萬餘日本紗廠工人也舉行罷工，這兩次罷工，都在工人的長期堅持和上海各日本紗廠工人，全國鐵路工人的援助之下得到了勝利。不久，青島日廠方，不履行條件，且以種種方法向工人挑釁，並『命令』中國官廳：『工人不安於工作，必須解散工會』，於是奉系軍閥官廳便向工人代表說：『工會應該取消，因為日本人望着害怕』。雖利誘、威脅，均遭工人堅決的鄙棄和抵抗。於是，日寇調集武裝，並嗾使其走狗，於五月二十八日晚，突然包圍工廠，屠殺工人，這便是『青島慘案』；在福州因反抗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而發生了『福州慘案』。

從此，帝國主義對中國工人運動和民族覺醒的鎮壓，採取了殘暴的屠殺政策。

同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紗廠槍殺工人領袖顧正紅，並傷十餘人，引起了各地工人的強烈反抗，特別是知識青年表示異常憤激，不顧一切犧牲援助工人和直接參加了鬥爭。二十一日，上海文治大學，上海大學學生分別舉行追悼、募捐、救濟死傷工人及其家屬，不料巡捕房竟逮去學生數名，並定期審訊。同時帝國主義提出威脅中國資本家的所謂『四提案』，增加印刷附律，增加碼頭捐，交易所註冊，取締童工法案。為着這兩件事，上海各校學生舉行露天講演，街頭宣傳，引起了廣大市民的同情和援助。

五月三十日，各校學生二千餘，分頭到公共租界、各馬路散發傳

單，進行講演，英捕乃到處捕捉講演學生，只南京路老關捕房一處，拘禁學生達數百名。三時許，羣衆萬餘人聚集於捕房門首，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而英帝國主義竟斷然下令開槍，向徒手的羣衆射殺，當場擊斃八人傷十餘人，這便是震動全國的『五卅慘案』。南京路大屠殺以後，羣衆更加憤激，到處舉行集會、講演。日、英帝國主義，則調遣武裝分佈各路要口，強佔民房校舍，槍殺拘捕進行羣衆日有所聞，白色恐怖達於極點。於是全上海八十萬工人在總工會的號令之下，舉行總同盟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甚至英租界的華捕也舉行罷崗表示反抗。

六月七日，上海運動的最高領導機關——工商學聯合會成立，加入這一組織的有：上海總工會、上海學生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各馬路商界聯合會（代表大資本家的總商會未參加）。工商學聯合會，表現了在反帝反封建鬥爭中各階層團結一致的精神。六月十一日，召集了一次二十萬人以上的羣衆大會，反帝情緒極其高昂。並提出了十七項交涉條件。主要內容：（一）立即撤退在華各種武裝，取消被嚴令；（二）送回被捕學生，恢復被佔、被封各校之原狀；（三）慰問、賠償、道歉，（四）華人在租界有言論、集會、出版之絕對自由；（五）優待工人，承認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之自由；（六）撤消印刷附律、加徵碼頭捐、交易所領照案；（七）制止越界築路；（八）收回會審公堂，取消領事裁判權；（九）巡捕頭應分配華人充任；（十）永遠撤退駐華之英、日海陸軍。

在羣衆反帝浪潮之下，帝國主義便開始轉變政策，欲使中國資產階級脫離反帝運動，然後再來鎮壓工人階級，於是，以『司法調查』，『關稅會議』為餌；以停止借款、通匯、運輸和電力供給中國工商界相威脅。在這種一打一拉的兩面政策之下，上海資產階級開始動搖，總商會遂採取了可鄙的行爲，修改十七條件，決定六月二十六日起單獨停止罷市，壓迫工人復工；中國軍閥則出面封閉工商學聯合會、上海總工會等。特別是九月七日（辛丑和約簽字紀念日）上海二十萬

羣衆在紀念『九七』國恥遊行中，又遭受到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屠殺。至此，上海羣衆運動乃暫時受到了挫折。

『五卅』慘案，不僅在上海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鬥爭，在全國各地也激起了反帝革命的洶湧怒潮，北京五萬餘學生的示威遊行，十餘萬羣衆所舉行的國民大會，都與軍警發生衝突；漢口各界罷工罷課罷市也橫遭屠殺。此外，九江、天津、濟南、開封……各地反帝運動幾無不與軍警發生衝突，演成流血的慘案，全國羣衆甚爲憤慨，特別在香港發生了極大影響。六月十九日香港十餘萬工人開始罷工，並提出要求，計分兩部：（一）擁護上海工商學聯合會之十七條件。（二）對香港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選舉、勞動立法、減低房租、居住自由等六項。香港政府則立即戒嚴，逮捕工人領袖，並向廣東政府實行封鎖。於是廣州香港的羣衆更爲激怒，六月二十三日，廣州七萬餘工人、學生、市民、軍隊舉行援助「上海慘案」示威遊行，至沙面附近英兵開槍掃射，英、法、葡砲艦開砲轟擊，當場擊斃羣衆五十二人，傷一百七十餘人，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沙基慘案』。沙基慘案發生後，廣州、香港的羣衆反帝情緒更加沸騰，廣東國民政府宣佈與英經濟絕交，封鎖海口；同時香港之中國工人，在工人領袖蘇兆徵，陳延年的領導之下，全部返省與廣州工人通力合作，是爲『香港大罷工』。在罷工委員會下面正式成立了工人糾察隊，厲行抵制英貨、日貨運動，並積極組織各地工農羣衆鞏固廣州國民政府的地位。省港大罷工，在廣東政府及廣東幾百萬有組織的農民支持之下，罷工堅持一年半之久。

『五卅』運動後，全國反帝運動的深入與擴大，使中國反帝反軍閥的革命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在先進的工人階級領導之下，中華民族的解放運動，始走上真正羣衆的、統一戰線的、反國際帝國主義的革命的、道路。正因爲這樣，『五卅』運動揭起了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序幕。

二 從北伐到四一二

『五卅』運動與香港罷工以後，廣東革命政府日漸鞏固與發展。在羣衆積極的配合下，鎮壓和肅清了盤據廣東各地的反革命勢力，尤其是一九二五年六月初，滇軍總司令楊希閔與桂軍劉震寰的叛亂平定後，廣東的局勢更形穩定，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七月一日，乃改大元帥府爲國民政府，並以黃埔軍爲骨幹，將各軍一律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從此，廣東政府成爲全國唯一的、鞏固的革命政權了。

時同，反革命則圖最後掙扎，乃以種種毒辣險惡的手段破壞革命。帝國主義利用陳炯明等軍閥於十月再起東江，並勾結川軍熊克武等，密謀叛變，企圖從根本上顛覆廣東政府，此舉失敗之後，又收買國民黨內落後和反革命的份子，分化革命。因而國民黨右派林森、鄒魯、謝持、居正、戴季陶、傅汝霖……等，以『反共』和『護黨』的名義，在北京西山召集反共會議；成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在上海則組織了辛亥革命同志俱樂部；廣州，北京等處更有孫文主義學會之建立，專事挑撥離間，企圖以此來破壞國共兩黨的團結。八月，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竟爲右派所刺殺。

國民黨在這種左派與反革命右派激烈的鬥爭中，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二百五十餘人，由於革命勢力的增漲，在會議中，左派終於獲得了完全的勝利，通過了許多革命的決議，接受了孫中山先生的遺囑與繼續執行革命的三大政策，並對右派分裂份子給予打擊。

但是，國民黨中一部份當權的份子（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仍然進行反共陰謀。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他們藉口中山艦失火，誣譏共產黨員陰謀暴動，調集武裝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及俄人住宅，宣佈緊急戒嚴，並逮捕海軍代局長兼中山艦艦長李芝龍（係共產黨員），及各軍黨代表（共產黨員）約五十餘人，這就是『中山艦事

變」。接着在右派的操縱之下，舉行了國民黨第二屆中執委第二次全會，通過了『黨務整理案』，限制共產黨的活動，剝奪其參加國民黨後任職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之權利。國民黨右派這種對於共產黨排斥分裂的政策，在國共兩黨的團結上劃了一道深深的裂痕。但是，當時共產黨的領導者，在此等事變中，却一味採取機會主義的退讓遷就態度，反而使國共兩黨的關係，日趨惡化，中國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爲了全部實現其陰謀，又積極佈置力量，計劃步驟，改變組織，於國民政府之下設獨攬黨政軍大權的總司令之職。然而，同時由於革命形勢的成熟，也作了出師北伐的準備。

一九二六年秋，偉大的北伐戰爭開始，國民革命軍從廣東出發入湖南江西向武漢前進，在廣大羣衆熱烈的擁護之下，北伐軍所向披靡，節節勝利，於七月十二日破敵於永豐，衡山，湘鄉等處，乘勝追擊，遂於七月十二日佔領長沙，二十一日攻克岳州。接着經過汀泗橋之血戰與賀勝橋一帶之肉搏（吳佩孚親自督戰），乃於九月初佔領武漢，十月入武昌城。至此，曾號稱十省聯軍的吳佩孚已潰不成軍，乃急電孫傳芳應援，於是北伐軍又在江西與孫軍發生激烈的爭奪戰，卒將孫部擊潰，佔領九江，南昌。孫軍退守南京，並求援於魯奉軍，北伐軍爲避免與奉軍衝突起見，決先攻閩、浙。福建於十一月攻佔，杭州亦入革命軍之手。在北方，九月，馮玉祥發表宣言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職，於十二月奠定陝西全省，同時四川、雲南、貴州各省軍閥，亦紛紛易國民革命軍職，從此，大江以南幾全部爲革命軍佔領。北伐軍之所以能這樣迅速進展，各地羣衆熱烈的對於革命軍之擁護與援助，實爲主要的原因。

一九二六年秋冬間，北伐軍進攻江西，孫傳芳節節失利之消息傳至淞滬後，上海情況異常混亂，上海資產階級發起自治運動；羣衆反孫傳芳擁護革命的運動也日益高漲，十月十六日夏超在浙江宣佈獨立，軍閥內部又非常不穩，在如此情形之下，上海工人爲了響應北伐，乃決定起義，但以無準備而失敗。一九二七（民國十六年）初，孫軍

潰退至南京，率軍準備入滬，上海情形更其混亂，羣衆反孫之情緒更爲熾烈。二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再舉行起義，結果遭孫軍殘酷之鎮壓而被摧殘。二次起義失敗之後，上海工人更積極的準備第三次起義，當北伐軍進入南京，杭州方面革命軍又逼進龍華時，上海八十萬工人乃舉行總同盟罷工，接着武裝起義，起義羣衆奪取了軍警的武裝武器了自己，並佔領各重要區域，向駐車站的直魯聯軍進攻，經過兩天一夜的衝殺和幾次激烈的巷戰，終於將直魯聯軍擊潰。師長畢應澄逃入租界。第三次起義在工人領導之下，完全靠羣衆自己的力量而終於獲得了勝利。這時國民革命軍在起義羣衆的邀請之下，始開抵上海。

由於軍事勝利的發展，遷都問題引起了爭論，結果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元旦，將國民政府遷至武漢。不久國民黨中央黨部亦遷至武漢，三月國民黨召集第二屆第三次中全會於武漢，決議加強黨的領導作用，製訂總司令條例，改主席爲主席團制，以便防止個人集權的獨裁傾向。本來是國民黨內民主與進步的表現，及對於當前問題正確的措施，但竟爲某些國民黨內不明大義的份子所猜忌，結果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便利用了這個罅隙。

當國民黨政府奠都武漢之際，一月三日，羣衆召集慶祝大會，與英軍發生衝突，羣衆死傷約卅餘人。是晚，羣衆復召集緊急會議，提出要求英帝國主義賠償，撫卹，懲兇，撤兵和退還租界等條件，提交國民政府辦理。當時國民政府全部接受了羣衆的意見並轉提交英國領事館，結果在羣衆的威脅之下，英國政府只得全部答應，隨即九江英租界也照數收回了。羣衆更加興奮鼓舞，革命如火如荼的發展着，反革命者甚爲恐懼。英、美、日、法、意等帝國主義，乃集議上海，提出最後通牒，並實行砲轟南京。中國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感到羣衆革命勢力的增漲對他們前途不利，帝國主義又施以種種壓力和引誘，賣國賊黃郛等則極力鼓唆包圍，於是四月十一日晚，乃有資產階級的軍隊襲擊上海工人糾察隊，解除工人武裝，封閉工會的事件發生。十二日，全滬工人聞訊大憤，集數萬羣衆於閘北開會，表示抗議，並整隊

往司令部請願，大隊軍隊則迎面開槍，並以機槍掃射，屍體狼籍，流血成渠，當時斃命者約在數百人以上，這便是中國資產階級叛變革命的『四一二』大屠殺。接着江、浙、閩、粵、桂諸省，都普遍殘酷的施行了以蔣介石、李濟爲首的所謂：『寧願殺一千，不可漏網一人』的屠殺政策，造成空前的白色恐怖，反革命却把它叫做『清黨』運動。

三 武漢的革命與反革命

『四一二』政變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深入與轉折的關鍵。資產階級叛變革命之後，在南京建立自己的『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相對立。南京政府是帝國主義羽翼之下的豪紳、地主、買辦和資產階級反革命聯盟的政權；而武漢政府則是建築在廣大羣衆運動之基礎上的工、農、小資產階級聯合的革命政權。因此雙方在對內對外的政策上都完全相反。南京反革命政府所採取的政策是：與帝國主義妥協，仇視蘇聯，殘酷的鎮壓羣衆反動運動，屠殺革命人民、摧殘工、農組織、封閉一切愛國的團體，完全成爲孫中山先生的叛徒。武漢政府則繼續了孫中山先生國民革命的方針，加強與共產黨的合作，廣泛的開展了民主運動，扶助工農組織和規定了廣大勞動羣衆督促政府機關辦法。並於四月十七日，發表斥責『四一二』政變及罷免其有關人物職務的命令。在三十萬人的羣衆大會上一致通過，反對反革命的所謂『清黨』運動。

當時武漢政府，雖處在反革命的南京政府、北京政府和西南一帶軍閥包圍之中，但據有湘、粵、贛和豫南廣大肥沃的地區，而且這些地區羣衆運動又特別發展，單農民協會會員，就在四百萬以上，且擁有幾十萬軍隊，武漢政府雖與南京對峙，但爲了消滅當前的主要敵人，乃決定繼續北伐，以唐生智爲總司令，率主力入豫，不久擊潰奉軍與國民軍會師於鄭州。

在武漢政府統治的區域內，羣衆運動空前高漲，爲着鞏固革命，

工人激烈的反抗了資本家的怠工，而且爲着鎮壓反革命的活動，工人自動組織武裝糾察隊，工會的威信增高，幾乎全體工人都參加了職工會，農民協會亦普遍的建立，幾乎到處都有農民協會，並成立武裝自衛隊，在許多地方農民協會成爲鄉村中的政權，領導農民反對土豪劣紳、抗租抗稅的鬥爭，並逮捕豪紳地主，加以審判和沒收其財產，特別是湖南有些地方，農民更自動起來廢除地主土地剝削制，查標，挖界和分配土地。在這種情形之下，垂死的封建勢力，則以種種方法圖謀反抗，並聯合一切反革命勢力圍攻武漢，以勾結潛匿於武漢的舊軍閥和內奸，慫恿武漢之不穩分子，來分化與動搖武漢政府之力量。帝國主義乃向武漢實行經濟封鎖，資本家和奸商們則故意關廠怠工，停止貿易，以至日用物品缺乏，紙幣跌價，工人失業，貧民生活難以維持。於是，武漢境內之經濟生活，遂陷於紊亂與恐慌的狀態，特別是土地革命的發展，一部分上層小資產階級，在激烈的革命行動中，表示恐懼，開始動搖，高唱「工農運動『過火』」，作爲變節之準備。因此，武漢政府的處境極爲嚴重與複雜。

在這種嚴重的關頭，共產黨於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在武漢舉行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結了幾年來革命之經驗，提出了鞏固武漢革命政府與克服當前困難的具體辦法。但黨內的機會主義的領導仍未轉變。而是時武漢後方反革命的叛亂迭起，政府的上層份子動搖逾甚。五月中旬，夏斗寅公然接受南京指示，乘革命軍入豫之際，率部叛變，並聯合劉佐龍部與四川軍閥楊森進窺武漢，不久叛軍雖爲廣大羣衆和英勇善戰的葉挺部隊擊潰，接着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馬日事變」（五月二十一日），實行武力解散國民黨左派省政府，封閉工會、農會、團剿工、農自衛隊之武裝，並大肆屠殺。至六月中旬，軍湖南一省被殺羣衆當在二萬以上。唐生智、朱培德、何健等均先後表示反共。在北方，西北軍領袖馮玉祥於六月，先後與武漢、南京雙方舉行兩次鄭州會議，以調解者自居而實際上與反革命完全妥協。並堅決要求武漢國民黨領袖實行反共政策。

武漢政府內部的分化與叛變接踵發生，使武漢政府的處境愈趨危殆，困難倍增。可是，武漢上層份子不僅未能依靠羣衆，堅決的去制止這些暴亂，克服這些困難，反而驚惶失措，畏懼羣衆運動的發展。而日益動搖，竟走上叛賣革命的道路上去了。六月初，武漢政府召集政治會議，決定解除鮑羅廷顧問合同，並頒佈保護剝削階級與限制工農活動之各種法令，限制軍隊中政治工作之特別法令。同時封閉湖北最大的兩個農民協會。至七月十五日，武漢政府舉行分共會議，武漢決定與共產黨分裂。同時，中國共產黨亦發表宣言，撤回參加國民政府之共產黨員，並痛斥反革命之罪惡。從此以後，在武漢形成了兩極端反動的局面，一切革命組織，羣衆武裝，工、農、學生團體盡遭取締與摧殘，大批共產黨員與前進之青年，橫遭慘殺，武漢政府已變爲南京反革命政府的附庸，所謂寧漢諒解，正如代表武漢反動上層份子的汪兆銘（精衛）所表示：「對蔣無私怨」，而向地主資產階級賣身投降了。

武漢政府反動之後，上層小資產階級投降了反革命，工人、農民、城市貧民則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重振陣容，繼續堅持革命，乃集中革命武裝，以武裝起義來反抗變節者的屠殺。七月三十一日，國民革命軍賀龍軍，葉挺軍在南昌起義。次日（八月一日），即成立革命委員會，組織革命軍，雖擁有兩萬多武裝，但因未及時與廣大農民運動聯繫，亦未發動廣大羣衆進行選舉，建立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權，和積極武裝羣衆，並宣佈明確的政治綱領。同時南昌仍處於強大的反革命勢力包圍之中，故不能在南昌立足。乃決定取道贛南，回師廣州，作爲發展之根據地。八月五日，賀葉軍退出南昌，沿途與反革命武裝發生極烈的戰爭，迂迴輾轉，終於時間延宕，長途跋涉，疲勞不堪，而反革命軍隊則早有準備，因此，當賀葉軍抵潮汕時，黃紹雄，徐景堂，饒大鈞等都嚴陣以待，激戰數日之後，終爲粵軍所敗。一部奔海陸豐與當地農民武裝結合，另一部由朱德率領，衝出重圍，折入湘粵贛三省邊境，發動農民游擊戰爭。

四 廣州起義與中國革命的新旗幟

武漢政府反動之後，反革命者暫時的形成了表面上的統一局面，在南京設立了國民黨的特別委員會和中央政治會議，均由蔣介石主持。唐生智，李宗仁在武漢；李濟琛在廣州；馮玉祥在鄭州；閻錫山在太原先後成立政治分會，表示政局統一，重新合作之意。但因對於大革命之果實分贓不均，以致內部衝突，仍極嚴重。於一九一七年秋，首先爆發了寧漢雙方，蔣介石與唐生智之間的『寧漢戰爭』，接着於同年十一月，又爆發了爭奪廣州之李濟琛，黃紹雄與張發奎，黃琪翔之間的『桂粵戰爭』。……

在任何反革命者所統治的區域，都施行着大致相同的政策：即剝奪羣衆之各種政治權利；任何羣衆性之集會、言論、出版都遭受摧殘，加重人民負擔，苛捐重稅則有增無已，農民在大革命中所得之利益被地主奪回，工人則倍受虐待，工資低下，生活高昂，失業日衆，打罵捕殺之事更層出不窮，白色恐怖遍於全國。進步團體和共產黨的活動完全入於地下狀態，大革命以來洶湧高漲之革命浪潮即刻逆轉低落，陷於不利與失敗的局面。

南昌起義失敗，並未挫折廣大羣衆鬥爭的情緒和勝利的信心，接着在湖南、湖北、廣東各地農民爆發了普遍的抗糧、拒稅和反對反革命統治的『秋收起義』。九月間，湖南平江瀏陽的農民軍佔領了湘贛間之平江、瀏陽、萍鄉，醴陵，株州等重要城市。湖北則有鄂南，蒲圻、咸寧、嘉魚、通城、通山、崇陽等地的武裝農民騷動。並截斷了武（昌）長（沙）路交通至半月之久。廣東海陸豐農民起義，在中共黨員彭湃的領導之下，於十月三十日——十一月一日佔領了海豐，隨即沒收和分配了地主的土地，組織了蘇維埃政府，這是第一面工農民主專政——蘇維埃土地革命的旗幟，勝利的飄揚在中國的領土上了。在武漢、上海、南京等各大城市裏的工人，也不斷的以罷工運動來

反抗野蠻黑暗的壓迫和搾取。但是，由於反革命力量的強大，這些壯烈的鬥爭，大都受到打擊和摧殘。因此，在全國範圍之內，革命的浪潮漸趨低落，各地農民暴動雖不斷地發生，但此起彼伏，表現出非常不平衡的現象。

在廣州，工、農羣衆運動都特別高漲。一九二七年十月以後，東江、北江、潯崖一帶數十縣的農民相繼起義，除海陸豐勝利的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之外，江東十餘縣也先後建立了蘇維埃政府。十一月七日，在海陸豐舉行了盛大的蘇維埃代表大會。

十一月，張發奎以『護黨運動』的名義，推翻了桂系政客軍閥李濟、黃紹雄的統治，而爆發了粵桂戰爭。粵桂戰爭發生後，造成廣州極其混亂的局面，戰爭加重了中小商人的負擔，物價騰貴，貧民生活艱難，限制人民的活動也更加厲害，省港罷工委員會被封閉，罷工工人的權利被剝奪，壓迫罷工工人出公共宿舍，逮捕槍殺罷工工人；並令反革命的『改組委員會』佔領工會會所，以種種的方法壓迫與剝削羣衆，因此廣大的羣衆極爲憤怒。工人不顧警察的壓迫和拘捕，於十月十四日舉行罷工，並召開羣衆大會，示威遊行，驅逐『改組委員會』選舉自己的工會。反動統治則以白色恐怖來威脅鎮壓。反而更加引起了羣衆的憤恨，十一月初，羣衆開始反抗白色恐怖，舉行示威遊行，至十二月初，羣衆鬥爭益形高漲，海員、郵局、印刷、汽車等工人都起來鬥爭。工人羣衆要求武裝起義，並自動的武裝起來準備起義。中共廣東省委乃決定武裝起義，並積極的進行各項準備工作。十月下旬，廣州軍隊大部調往前綫，守軍日漸空虛，廣州的局面極其混亂，中共廣東省委公開的號召工人武裝起義。

十二月十一日晨，在中共廣東省委張太雷領導下開始武裝起義，隨即協同教導團、警衛團起義之士兵佔領了廣州各政府機關，成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立即宣佈與執行蘇維埃政府的任務：（一）組織蘇維埃政府；（二）擁護蘇維埃政權；（三）實行蘇維埃的政策；（四）向反革命進攻；（五）打通與海陸豐聯絡的道路。並正式成立革命

軍事委員會，建立工農紅軍，頒佈土地法、勞動法等蘇維埃政策。粵桂軍接到廣州革命起義之消息後，雙方立即妥協停戰，並聯合向廣州蘇維埃政權進攻，李福林軍則在英軍的掩護之下反攻。赤衛軍雖在衆寡極端懸殊之下，發揚了工人階級的英勇頑強的戰鬥精神，激戰達三日之久，死傷過半，總指揮張太雷亦戰死，而保衛廣州蘇維埃政權的血戰，終於失敗。同時被反革命軍閥屠殺的羣衆，約在七八千人以上。但廣州起義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燦爛的光輝，因爲它不僅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在革命轉入低潮時『退兵的一戰』的英勇精神；表現了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能力，與農民羣衆親切的聯繫，開始舉起了蘇維埃運動的新旗幟，將中國革命推入新階段，而且對於世界革命，尤其是東方殖民地革命運動有着重大的意義。

（中國歷史簡明教程第四編）

第二輯 論文選讀

一 中共與大革命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戰爭

自從一九二五年開始的中國革命戰爭，已經過去了兩個階段，即北伐戰爭階段與蘇維埃戰爭階段；今後則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這三個階段，已經是而且也不能不是被中國無產階級及首領中國共產黨所領導，或參加了這個領導。因為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敵人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中國資產階級，特別是帶買辦性與封建性的大資產階級，雖在某種歷史時機可以參加革命戰爭，然而由於他們的自私自利性與政治上經濟上的軟弱性，不願意也不能，領導中國革命戰爭走上徹底勝利的道路。中國農民羣衆與小資產階級，是願意積極的參加革命戰爭，並願意使戰爭得到徹底勝利的，然而由於他們的小生產性，使他們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份失業羣衆則準備着無政府思想。因此他們是革命戰爭中的主力軍，但不能成爲戰爭的正確的領導者。因此，在無產階級政黨已經形成的時代，戰爭的正確的領導責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國共產黨的肩上。在這種時候，任何的革命戰爭如果沒有或違背無產階級與共產黨的領導，那個戰爭是一定失敗或不能進入徹底勝利的。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社會各階層中，只有無產階級及共產黨，才是比較沒有狹隘性與自私自利性，比較最有遠大的政治眼光與最有組織性，而且也最能虛心接受世界先進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經驗用之於自己的事業。因此，只有無產階級與共產黨能够領導農民、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克服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狹隘性，克服失業者羣的破壞性，並且能够克服資產階級的動搖與不徹底性（如果其

產黨不犯錯誤的話），而使革命戰爭走上勝利之路。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基本的說，是在國際與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影響與政治合作之下進行的。然而當着革命與戰爭的緊急關頭，首先由於大資產階級的叛變，同時也由於革命隊伍中機會主義者的自動放棄領導權，這次革命戰爭就因而失敗了。

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蘇維埃戰爭是在新的情況下進行的。戰爭的敵人不但不是帝國主義，而且是大資產階級與大地主聯盟的統治。民族資產階級則作了大資產階級的尾巴。領導戰爭的，唯一的只有共產黨。共產黨的這種絕對的領導權，是使戰爭堅持到底的最主要條件，沒有共產黨這種絕對的領導，是不能設想戰爭能有這樣的堅持性的。

中國共產黨是英勇堅決的領導了中國革命戰爭，在十五年的長久歲月中，在全國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天都是爲了保護人民的利益，爲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火線的最前綫。（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第二章）

毛澤東同志在大革命時代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成立到現在，統共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却進行了，手創了三次偉大的革命，大踏步地走了革命的三個階段：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這個二十多歲，朝氣勃勃的青年——中國共產黨——幹了三件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大事。

毛澤東同志在這三個革命階段中的主張、見解、政策、戰略——全部革命的理論和實際，都是天才的正確的英明的。

在這三次偉大的革命當中，有過不少的波折。由於黨的戰略、路線之正確或錯誤，決定革命的勝利或失敗。我們現在已能明顯地看出，在這三個革命的階段中，凡是違反毛澤東同志的理論、主張、政策時，革命便遭受挫敗；凡是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方針作去時，革命便勝利地前進。而且——這是最傑出，最難得的一——由於黨的個別領導者

政策戰略的錯誤，革命遭受嚴重挫折時。總賴有毛澤東同志出來，把舵一掌，革命於是得救，得仍按軌道（革命的、歷史辯證的軌道，不是機械的預定的軌道）進行。這是三個革命階段中所屢試不爽的。領導常常能決定一切。領導是一種藝術。毛澤東同志掌握了這一藝術，這就使他的領導正確。這就叫做英明、天才。這就使毛澤東同志成為中國人民及其黨的偉大的領袖，中國革命的舵手和歷史的火車頭。

『大廈如傾要檣棟，青眼高歌望吾子』。

『時危知俊傑，世亂識忠臣』。

每到革命形勢嚴重，革命者隊伍中因思想方法，領導方式不對，革命有完全搭台之危險的時候，尤其現在當國民黨反動派堅持獨裁、內戰，實行法西斯蒂野蠻恐怖統治，借美國帝國主義份子的幫助，殘殺國人，將全部國家民族利益實際送給美國，作為牠的保護國，喪失民族獨立自由，國民黨反動派這樣禍國殃民，國家民族處在生死存亡關頭的時候，對毛澤東同志不禁想起上面的一些詞句。

共產黨如何幫助國民黨建黨的

中共第三次大會（一九二三年）以後，毛澤東同志被調到中央工作。三次大會通過了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決議：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進行國民革命。從這時起，在國內開始建立一個人民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軍閥的統一戰綫。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求得獨立、解放、自由之唯一的革命道路，馬克思主義給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指出了這條道路。在這個時期毛澤東同志站在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做著民族革命統一戰綫的工作，從幫助國民黨建黨，一直到作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

這裏讓我們簡單地回憶一下歷史事實是有必要的，因為現在國民黨中有人『數典忘祖』，捏造歷史，胡說八道，我們有責任歸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辛亥革命是失敗了——這是孫中山自己也承認的，辛亥革命後，

同盟會改爲國民黨。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的『二次革命』也失敗了，袁世凱下令把國民黨解散。一九一四年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一九一九年又改爲中國國民黨（那時我們的林祖涵同志作總務部的工作。還是管黨務的部門）。中國國民黨當時很不像一個政黨，除海外（南洋、美國）有其黨部，這些黨部能供給孫中山以錢外，在國內各地毫無基礎。孫中山曾長期爲此焦急，但很少辦法。

恰好，一九二〇年七八月共產國際開第二次大會，『規定共產國際與在政治上受壓迫而且有資本（帝國）主義制度佔統治地位的國家（例如中國與印度）內革命運動之間的相互關係』，即『共產國際應當與今日政治上和經濟上被壓迫各國參加推翻帝國主義事業的革命勢力取得密切的聯絡』（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決議案）。列寧在大會上代表『民族與殖民地問題委員會』作了報告，熱烈地主張援助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革命運動。二一年初上述委員會的祕書馬林來到中國，找中國民族解放的領導團體和民族英雄作朋友。三月馬林來到了北京。經李大釗同志找吳佩孚的祕書長白堅武（大釗同志在北洋大學的同學，現爲漢奸），介紹馬林去見吳佩孚，在那裏住了二個月。馬林對吳佩孚失望：見吳佩孚不是民族解放的領導人。馬林乃由河南，湖北陸路去廣東，八九月間會見了孫中山。馬林說法文，張繼翻譯。馬告孫以來意——找朋友。孫、馬談中國情況，談十月革命。孫中山很喜歡，真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馬林向孫中山提兩點意見：（一）要進行中國革命，就要有好的政黨。這政黨要聯合各個階層，尤其是工農大眾；（二）要有革命武裝的核心（過去孫中山等只聯絡匪幫），要辦軍官學校。孫中山聽了大喜。要辦政黨一點尤其與中山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九年以來的意見吻合。自俄國十月革命後，中山也知道了，革命非有武裝不可。

但是如何建立起一個像樣的黨呢？當時國民黨內地既毫無基礎，也沒有人去作組織工作。比方湖南的周道廣，覃振，北方的王法勤，丁維汾，四川的謝持，吳玉章，都是有名的老同盟會員國民黨員，但